

高等学校教材

#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朱成器 徐 砚 主 编  
吕云生 仇洪伟 副主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朱成器,徐砚主编。—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9

ISBN 7-81000-474-3

. 中... . 朱... 徐... . 古典文学-中国-教材  
. I 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554 号

2000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朱成器 徐 砚 主编

责任编辑:赵东方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惠新东街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网址:[http:// www .uibep .com](http://www.uibep.com)

---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字数 334 千字

199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

ISBN 7—81000—474—3/H·088

印数 130001—16000 册 定价 19.00 元

## 前 言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科学系中国语文教研室的的教学成果之一。

根据培养目标，外语、财经、政法、理、工、农、医等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不仅需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具有较好的语言文学修养。徐中玉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全国外语院校合编的《古代诗文选》等教材，适时地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为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从各方面向大学生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向更广阔、更丰富、更高层次探求和学习的愿望。在这种情势下，我们感到，在高等学校要继续加强学生的语言文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加强基本技能训练，要继续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学修养水平，仅开一、二门语言文学课程是不够的。于是，我们开出多门课程，供学生选学，这种作法，受到学生的欢迎。课程开出的同时，要进行教材建设，《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的编著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础教材，大多采用文选体例，以文章篇目为序编排全书。这种体例有它的长处，但学生认为，这样编排的教材与中学语文课本面貌太相象，看不出明显的变化。我们考虑学生在高等学校非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语文，是在中学语文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又不同于对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要求，因此在教材、教法上，既不应是中学语文的简单延续，也不应是语言文学专业所要求的那么全面、系统，而应突出重点，专题深入。为此，我们不再采用文选体例，而编著了《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在结构全书设置专题时，我们没有过多地考虑从中国古代文

学的产生、发展、变化作逐朝逐代的、面面俱到的选题安排，而着重从学生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的实际需要考考虑，抓住重点，设置专题。共安排了“诗经”、“楚辞”、“先秦散文”、“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小说”、“唐诗”、“唐五代词与宋词”、“唐宋散文”、“元曲”、“明清小说”九个专题。这些专题的内容，汇集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重点学习这些专题，便于在有限的课时内收到效果，达到课程的教学目的。另外，在这些专题中，有的内容又是其他同类教材不涉及或极少涉及的，比如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小说，就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来说，在当时还不甚成熟，不甚完美，但这些小说所反映出的传说、神话、轶闻、野史、怪异、趣谈等各个方面的、丰富有趣的内容，直至今日依然常被引用，有时还被文学艺术家用作创作的素材。因此，安排这方面的内容，显然是有益的。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的每一个专题，均由“通论”和“作品”构成。“通论”部分，就该专题涉及的历史时期文学样式的出现，文体的特点，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及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影响等，作史论结合的论述。“通论”既是学生自学该专题的基本内容，也是教师讲授该专题的纲要。“作品”部分，其作品的选录服从于“通论”讲授的需要，除选录名家名作外，也选录了其他可读性强的、与现实关系密切的作品。学习“作品”部分，可以通过作品实例进一步掌握“通论”内容，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功力和鉴赏水平。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由各自相对独立的专题构成全书，因此，使用时可根据课时的长短，学生的程度和要求，或增或减；学习专题的先后次序，也可按需要调整。此外，这部教材也可作为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及经贸院校双学位考试的参考书。

编著中，我们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总结了我们在教学与科研中的心得。我们期待，在今后的修订中将进一步提高它，使它更为完善，成为一部资料较丰富、论述较精当的教

材。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由朱成器、徐砚任主编，吕云生、仇洪伟任副主编。各专题执笔者如下：“诗经专题”为吕云生，“先秦散文专题”为刘传志，“楚辞专题”、“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专题”为仇洪伟，“唐诗专题”、“唐宋散文专题”为杨立群，“唐五代词与宋词专题”为张石榴，“元曲专题”为方敏，“明清小说专题”为朱成器。编著中，我们参阅了有关的著作、论文，得到许多帮助，并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科学系黄海舟副教授审阅，在此一并致谢。限于编者水平，书中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徐 砚

1991年3月

# 第一专题 诗 经

## 第一部分 《诗经》 通论

### 一、《诗经》 概述

#### (一) 《诗经》 的名称、编排和篇数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约五百余年诗歌共三百零五首。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代，学者们把它奉为儒家经典之一，始称之为《诗经》。

《诗经》中的作品本来都是可以由乐器伴奏演唱的乐歌，所以《墨子·公孟篇》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它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所谓“风”是指地方音乐，包括十五国风，即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是“正”的意思，当时人们把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看成是“正声”。它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是朝会时所奏音乐，《小雅》是一般宴飨时使用的音乐。《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颂》诗包括《周颂》、《鲁颂》、《商颂》。

《诗经》各部分的篇数分别是：《国风》160篇，《大雅》31篇，《小雅》74篇，《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 (二) 《诗经》的作者、创作年代和产生地区

《诗经》各篇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无法考知的。这是因为：《国风》的全部及《小雅》的一小部分都属于民歌，而民歌的创作带有集体性的特点，作者的姓名总是不流传的；其余作品为贵族所

写，大多也未留下姓名。只有五篇，在行文中提到作者本人，如《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但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没有任何材料可考。

《诗经》各篇的创作年代也很难一一确定。但从它们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特点来看，大体可以确定：《周颂》全部和《大雅》大部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大雅》的小部和《小雅》的大部写于西周末年；《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的全部则为东周前期所作。

《诗经》产生的地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确定。十五国风都标明了所在封国的古代名称。如《齐风》是春秋时齐国的民歌，齐地在今山东省境内；《周南》、《召南》产生于南方，主要在长江、汉水和汝水流域；《王风》是流行于王都地区的民歌，大致源于洛阳一带。《大雅》全部和《小雅》大部是王朝士大夫的作品，因此多应产生于西周和东周的首都地区，即镐京（今西安西南）和洛邑（今洛阳西五里）。《颂》诗是王朝祭祀的乐歌，其制作当是在宫廷庙堂之内。《周颂》作于周初，故也产生于镐京；《鲁颂》作于鲁国首都，即今山东曲阜；《商颂》是宋国作品，宋都在今河南商丘。总的来说，《诗经》产生的地区大致包括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而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这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域。

### （三）《诗经》的采集与成书

翻开《诗经》，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三百多篇作品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诗的形式基本上是整齐的四言。上面谈到，它们产生的年代前后跨越五百余年，包括的地域又极为广阔。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不经过有意识、有目的的采集和加工，这样一部体系完整的诗歌总集的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究竟是谁，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些诗搜集和编订起来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争议。汉人有所谓“王宫采诗”之

说，认为上古时代，君王为体察民情，考其政治得失，常常派人收集民间的歌谣土风，最后集而为诗三百篇。但这些学者在对采诗的具体方式上解说不一，甚至相互矛盾，因而受到后人怀疑。我们认为，采诗之说是根据的。《诗经》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周王朝在各诸侯国的协助下于民间搜集诗歌。《国风》和《小雅》的小部分诗就是这样集得的。当然，采诗的目的除了了解民情，还有娱乐的一面。二是贵族们为特定场合如祭祖、宴客、出猎、房屋落成等典礼，以及为讽谏、颂美等目的而向君王进献的诗。《颂》、《大雅》的全部和《小雅》的大部分诗都属于此类。上述两部分诗最后由周王朝的乐工和太师们集中起来，予以系统的编排、加工，如在字句和用韵上作一点改动，并使它们在形式上统一起来。它的最终成书当不晚于春秋中叶。

《诗经》最初是曲谱与歌词合一的。在流传过程中，各部分诗歌的乐调之间发生过混淆。对此，孔子曾作过整理和校订工作。他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这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但汉人据此认为《诗经》是由孔子最后删定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是不可信的。因为有证据表明，在孔子幼年时代，《诗经》中“国风”的次序与今本已大体相同；孔子整理《诗经》以前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诗三百”的话。对“删诗”之说，学术界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

#### （四）《诗经》的应用与流传

《诗经》常用于祭祀祖先、朝中典礼和宫廷娱乐等场合。除此之外，周代还有一种很独特的现象，就是在政治和外交场合，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某种意愿时，往往不直接说出来，而是引用《诗经》中的某些篇章，隐晦地暗示出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所谓“赋诗言志”。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引证并不管作品本身的内容

和整体意义,而是采用“断章取义”的方法,仅仅把自己的观点或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显得委婉含蓄,斯文有礼。久之就形成一种习惯和风尚。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但是到了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诸侯间战争的频繁,这种温文尔雅的贵族式外交方式就被游说之士铺张扬厉甚至耸人听闻的风格所取代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诗经》和其他儒家典籍一样,遭到焚毁。西汉初,一些儒生凭着记忆把《诗经》原文及前人的解释整理记录下来,使之由此又得以流传。当时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赵人毛萇。人们或取地名,或取姓氏,简称之为齐诗、鲁诗、毛诗、韩诗。它们在《诗经》原文的用字和解释方面都有一定差别。传统上把齐、鲁、韩三家诗称为“今文”,把毛诗称为“古文”。

三家诗西汉时都立于学官,毛诗则属私人传授(直到西汉末平帝时才得立)。东汉时,郑众、贾逵、马融等著名学者皆研治毛诗,郑玄又为毛传作笺,毛诗于是大为盛行,而三家诗逐渐衰落。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至宋代,韩诗亦已湮没。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就是毛萇(一说毛亨)作传,郑玄为笺的毛诗。

## 二、《诗经》的内容

我国古代书籍在长期流传中往往出现讹误、掺假等现象,由于时代久远,一时真假难辨。《诗经》则不同,由于它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它的本来面貌被保存得最为完整,其中的诗篇都是真实可信的,从而为我们对古代的文学和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诗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反映爱情与婚姻的诗篇

《诗经》中有大量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篇章,其中以《国风》为最多,艺术性也较高,它们大多产生于民间。

在《诗经》的时代，封建礼教对婚恋的严酷束缚还没有最终形成，男女之间的交往还比较自由。许多诗歌坦诚、大胆地描写了青年男女的相爱之情。它的基调健康、乐观，感情真挚、热烈，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如《邶风·静女》写一个男青年怀着喜悦的心情与自己所爱的女子幽会。但到了会面地点，姑娘却调皮地躲了起来，怎么也找不到。急得他“搔首踟蹰”，不知所措。后来女青年出现了，送给他一支红色的笔和一束柔嫩的茅草，他高兴得心花怒放，喜不自胜，这两件礼物在他看来漂亮非凡，放射异彩。全诗写得逼真生动，把姑娘的天真活泼、小伙子的憨厚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郑风·溱洧》描写了在春水涣涣，游人如云的节日里，青年男女群游嬉戏的欢乐场面。其间插入一对情人的风趣对话，反映了爱情生活的和谐与美妙。《郑风·褰裳》则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写出一位女子对自己所钟爱的人的戏谑、嘲弄。“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她那大胆、泼辣的个性即使在后来的诗作中也是罕见的。

除了表现热恋的欢乐外，对相思的焦灼、失恋的痛苦，《诗经》许多篇章也有生动的描述。《周南·汉广》吟咏一位男子求偶而不能如愿的叹息。第一章连用四个比喻，说明意中人的可望而不可即；第二、三章前半部幻想娶妻迎亲的情景，后半部分回到现实，感慨自己的梦想不可实现。全诗感情缠绵、深切。《郑风·狡童》诉说了一位女子因情人不再理睬她而寝食不安的心绪。《郑风·子衿》写出女主人公渴望与情人相见的焦急心情。“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生动表现了其相思之深。值得注意的是，《国风》中的许多诗篇深刻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爱情生活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忠贞不渝的品格。《郑风·出其东门》以朴素的语言道出了男主人公对恋人的专一和忠诚。东门之外虽有如云的美女，但他一心思恋的只是那“缟衣綌巾”的姑娘。《王风·大车》中的男子想约所爱的女子一块逃跑，又怕她没有这个胆量，于是指天发誓：“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表达了与之同生共死的坚定

信念（一说《大车》的主人公为女子）。

然而，《诗经》的时代毕竟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礼教的桎梏正在形成，男女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而首先遭到束缚和摧残的是女性的爱情愿望。《郑风·将仲子》写一个女子虽然很爱她的情人，但父母兄弟的干涉和舆论的压力又迫使她不得不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情劝告对方不要到自己家来会面。但也有无所畏惧的女性，她们敢于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睽风·柏舟》就描写了一位大胆的女子，她自己选择了配偶，当父母逼迫她放弃恋人时，她以死相争，表示了非他不嫁的坚定决心。而更令人同情的是那些被迫吞食不合理婚姻苦果的妇女们。《卫风·氓》写了一位妇女被遗弃的故事。她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丈夫，以辛勤的劳动改善了家庭生活，但负心的男子在骗取了她的钱财和爱情后却无情地抛弃了她。她凄凉地回到娘家，又遭到兄弟的耻笑。回首往事，她满腔悲愤，悔恨交加。反映当时妇女类似遭遇的“弃妇诗”还有《邶风·谷风》、《郑风·遵大路》、《王风·中谷有蓷》等。

## （二）反映社会矛盾的诗篇

周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贵族农奴主阶级和农奴之间的矛盾，而前者对后者的残酷经济剥削和人身奴役则是这种矛盾的深刻根源和典型表现。《豳风·七月》描述了劳动者充满血泪的凄惨生活。他们无冬无夏地种田、打猎、纺织，到头来却过着“无衣无褐”，吃糠咽菜的苦日子。“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他们的劳动果实被无偿地剥夺，甚至劳动妇女的身体也被他们占有、蹂躏。这是一幅当时社会的残酷现实的真实图画。当然，对《七月》这首诗也不能作过于简单的分析。它同时还总结了丰富的劳动经验，记载了包括时令、草木虫鱼、风俗习惯等在内的事物，它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

如果说《七月》还仅仅是在客观的描述中透露出些许不满情

绪的话，《魏风·伐檀》和《硕鼠》则公开地对剥削者提出了愤怒的谴责。《伐檀》是伐木工人之歌，它义正辞严地质问那些“君子”：你们“不稼不穡”，“不狩不猎”，为什么白白拿走我们辛劳生产的大量粮食？你们的院子里为什么挂满了别人打来的猎物？《硕鼠》进一步形象地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表现了人民不堪忍受压榨，想逃亡到没有人啼饥号寒的“乐土”中去的强烈愿望。尽管这在当时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但它仍然鲜明地反映了人民对农奴主阶级的唾弃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除了经济剥削，频繁战争和沉重的徭役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它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使人们长期骨肉分离，经受磨难。《诗经》中很多征夫思妇之诗就是这种严酷现实的反映。《邶风·击鼓》表现了士兵厌战思妻的愤懑情绪。《豳风·东山》描写了一个久戍将归的士卒怀恋家乡、思念妻子的内心活动，感情深沉，想象丰富，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周南·卷耳》等则写出了妻子对远方丈夫的无限思念。

统治阶级本身的腐败、荒淫和暴戾往往是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催化剂。它们不仅为劳动人民所痛恨，也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们的不满。《诗经》中有不少政治讽刺诗，揭露和抨击了昏君佞臣们的无耻行径。它们的作者有劳动人民，也有贵族士大夫。

《秦风·黄鸟》痛斥了秦穆公死时用活人殉葬的残暴行为，诗中充满了抑止不住的悲愤。《邶风·新台》讽刺了卫宣公为儿娶妻，中途截留，据为己有的丑事。《睥风·墙有茨》、《陈风·株林》、《齐风·南山》等揭露了宫廷内的淫乱秽行，对这些衣冠禽兽表示了极大蔑视。

《大雅》、《小雅》中的政治讽喻诗大都产生于周室衰微的厉王、幽王到平王东迁一段时期。它们出于士大夫之手，虽不及《国风》中的诗尖锐、富于战斗性，却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国家的

动乱和人民的痛苦，表现了对腐败的不满和批判态度。《小雅·十月之交》抨击群小乱政，倒行逆施，引得天怒人怨，灾异迭起。“烨烨震电”一段写得惊心动魄，反映了王朝崩溃前夕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气氛。《小雅·正月》也从天时示警写起，表达了作者感时忧国的沉痛心情，描绘了人心浮动，流言四起，统治者又以高压手段迫害异己，弄得连士大夫们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严酷环境。《小雅·小弁》更形象地形容了这种迫害：“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大雅》中的《荡》、《瞻》、《抑》、《如箎》等诗的作者可能属于社会地位更高一些的人物，他们面对国势颓败的现实和自己身处险境的遭遇，也忧心忡忡地发出了警告：“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总之，一部《诗经》为我们提供了周代社会激烈的阶级矛盾和冲突的真实历史画卷。从中可以看到压迫者凶残丑恶的原形，也可以听到被压迫者呻吟、反抗的呼号。

### （三）记载周部族历史的史诗

《雅》、《颂》中的一些诗篇在为周王朝歌恭颂德的同时，也鄙较客观地记录了周部族发展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有五篇，即：《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些诗叙事性很强，记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和传说。

《生民》是关于后稷神话的最早而又最完整的记录。它以质朴的语言，充满神奇色彩的情节，塑造了周人祖先后稷的英雄形象。相传后稷是农业的发明者。诗中写他小时候就试种各种庄稼，庄稼长得很好。它反映了原始社会进入以耕种为主要生产活动的时代之后，远古人民对发展农业的渴望。从中可以看出，周部落大体是出现于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其余四篇诗反映的历史比较靠后。《公刘》、《绵》描写了周人由邠迁到豳及由豳迁到岐山的两次迁徙情形；《皇矣》写文王伐密、伐崇两次战争；《大明》写武王灭商的经过。这些诗篇构成了今天

研究我国上古史的重要资料。

#### (四) 反映生产情况和礼俗的诗篇

生产活动是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周代以农业为主，反映农事的诗歌很多，主要有：《国风》中的《七月》，《雅》诗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颂》诗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篇。从这些诗对农田、农具、耕作手段与作物生长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周代的农业已相当发达。《载芟》中有“千耦其耘”等描写，说明当时曾采用奴隶化的大规模生产。

《小雅·无羊》和《鲁颂· 》两篇还描写了畜牧活动的场面。《无羊》以清新的笔调描绘了成群的牛羊在山坡上漫步吃草，牧羊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餐风宿露的优美宁静的景象。《 》则勾画了一群品种不同、神态各异的奔马，把它们描绘得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雅》、《颂》中的大量作品是为祭祀、宴会等宫廷活动而写的，其内容不外歌颂祖先的功德及神鬼的威灵，形式呆板，没有生气，思想和艺术价值都不高。但它们对于祭祀、宴飨的各种仪式、礼节和场面的描写却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的礼俗和人们的宗教观念。另外例如对《周南·桃夭》祝贺女子出嫁，《唐风·椒聊》祝贺多子多孙等情景的描写，都可以从民俗学的角度加以研究。

总之，《诗经》反映的生活画面是极其广阔的，它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风貌。

### 三、《诗经》的艺术特色

#### (一)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它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描写事物和生活，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既有较高的概括性，又十分具体、生动。这种创作方法被后代称为“风雅”风格。

《诗经》中一些篇幅较长的作品含有丰富的细节描写，使我们读来具体可感，仿佛领略着一幅幅细腻的生活画面。《七月》

是最典型的例子。它详尽描述了农家一年四季的生产、生活情况，包括田间操作、采桑养蚕、纺织缝裳、打猎酿酒以及农民的衣、食、住、行等，十分真实，“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方玉润《诗经原始》）。显然，这首诗出于普通劳动者之手。其他象《邶风·谷风》、《卫风·氓》、《豳风·东山》等，也都以细节描写见长。《雅》、《颂》中一些诗描写农事、畜牧、田猎、宫室建造等，笔触也十分细腻。如《小雅·车攻》写围猎，把车马的雄壮，旌旗的招展，调弓择箭，“舍矢如破”的技艺写得有声有色。《大雅》中的《绵》写古公蚩父带领人们营造房屋的热火朝天的场面，《生民》写庄稼茂盛、五谷丰登的情形，都令人产生如见其事，如闻其声之感。

《诗经》中大量作品是篇幅较短的抒情之作，它们虽然不能容纳较多的细节描写，但往往能够抓住某一生活侧面或场景，加以准确、生动的刻画，突出其特征，同样给人以具体形象、真实自然的感觉。如《王风·君子于役》写一个妇女在“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一派暮色中思念丈夫，《魏风·十亩之间》写采桑收工时轻松愉快的情景，把当时特有的气氛充分表现出来。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诗经》也显示其现实主义的艺术特色。尽管许多诗主要是抒发主人公内心的感情，但其间不乏准确生动的外部形象、动作、对话等的描写。如《卫风·硕人》描写庄姜轻柔的手指，洁白的肌肤，光润的牙齿，弯弯的娥眉，顾盼的美目和动人的笑容，活脱脱是一幅呼之欲出的美人图。《邶风·静女》只“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一句，就把男青年焦急企盼的神态勾勒了出来。《邶风·简兮》则描绘了一个舞师威武雄壮的舞姿，有声有色，活跃如生。《郑风·女曰鸡鸣》通过夫妻二人起床前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和睦美好的家庭生活。

总之，《诗经》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核心精神是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它对后世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 (二) 比兴手法的运用

赋、比、兴的说法最早见于《周礼》，它们与风、雅、颂合称为“六诗”，《诗经·大序》又把它们称为“六义”。前面我们提到，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而分成的三种诗歌类型，而赋、比、兴，根据后人的研究，实际上是三种艺术表现手法。所谓《诗经》“六义”并不是同一类的东西。

“赋”，据宋人朱熹的观点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也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相对而言，《雅》、《颂》中这种手法使用得较多一些。由于这是文学创作上最基本的手法，故一般都不把它作为《诗经》的一个艺术特点。在《诗经》中，尤其是《国风》中，用得比较多而又非常成功，从而构成其艺术特色的是比和兴的手法。

“比”，朱熹下的定义是：“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说得简单些就是打比方。比喻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由于民歌的作者们熟悉生活，对各种事物的特点及其类似之处有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感受，所以《诗经》中的比喻使用得非常广泛、生动、贴切。它“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文心雕龙·比兴》），使作品更加形象和生动。例如《魏风·硕鼠》用老鼠来比喻不劳而获的剥削者，《齐风·南山》用雄狐比喻淫乱无耻的齐襄公，《邶风·新台》用癞蛤蟆比喻好色淫乱的卫宣公，把这群丑类的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深恶痛绝。《周南·汝坟》拿鱼尾变赤比喻劳动者的疲惫憔悴，《卫风·氓》用桑树由繁茂变得凋敝比喻爱情的失落，《周南·螽斯》用蝗类聚居比喻家人多子，等等，这些取自生活的生动比喻使作品大为增色。

“兴”的意思是“起”，朱熹认为《诗经》中的“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手法，也就是借描写其他事物来为诗歌开头。有些诗起兴的句子纯粹是为了起头，与下文在意义上没有什么联系。如《睽风·柏舟》写女子要求婚姻自主，宁死不改

其志，以“泛彼柏舟，在彼中河”开头。不直接着笔于内容是为了曲折委婉，不给人以突兀之感。但也有许多起兴之句与下文有联系。它们或者渲染、烘托某种气氛，为下面的描写创造一种意境，如《秦风·蒹葭》，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开头，用清秋萧瑟苍茫的景色衬托主人公寻求意中之人而不可得的惆怅心情；或者对下面所写的人物、事物起比喻作用，加强作品的形象性，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令人由鲜艳盛开的桃花联想到行将出嫁的女子光彩照人的姿容；《邶风·谷风》以“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起兴，暗示了将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两句起兴，直接引出了下面“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正文，借助同类事物的联想，显得自然、生动、贴切。

总之，《诗经》中比兴手法的运用是非常成功的，它显示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深刻观察、感受以及丰富的想象力，赋与作品以极大的艺术魅力，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三）语言形式的特点

四言句是《诗经》的基本格式，它们语气自然，句法多样，形式整齐，是相当成熟的诗歌语言。但有许多诗篇，尤其是民歌，为了表达的需要，常常突破四言的定格，杂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显示出灵活多变的特点，读起来节奏自然，错落有致。如《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中路。”杂用了二言、三言、四言、五言的句式，长短搭配，具有一种错落自然之美。《邶风·北门》、《魏风·伐檀》、《周南·卷耳》等都是出色的杂言诗。

章节的复沓是《诗经》语言形式的又一特点。许多作品的前后各章都采取重复的手法，中间只换某些词句。如《周南·采芣苢》三章十二句，只换了六个动词，其余都两次重复。这种形式产生于《诗经》的乐歌性质。作者的感情在反复咏唱中得到了充分表达，同时它也给作品带来了回还反复的节奏感和音乐性。有